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经济增长： 理论与实证研究

钟晓君 李江涛

摘要：本文在剖析服务业 FDI 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对服务业 FDI 与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业 FDI 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表明服务业 FDI 通过产业聚集效应、公共服务创造效应以及服务贸易效应对服务业经济的发展施加积极影响。另外，服务业国内投资对服务业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应重视与提高内资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实现服务业 FDI 与服务业国内投资对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协同推动。

关键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 (2016) 01-0066-09

一、引言

服务业 FDI 作为资本、技术与经营管理理念的结合体，对投资地的资本形成、产业培育、市场结构以及制度环境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水平施加作用。各种经济理论从不同的维度阐述了外商资本流入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与途径。罗斯托起飞模型（Rostow, 1960）、双缺口模型（Chenery and Strort, 1966）和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 Solow（1956）、Swan（1956）、Cass（1965）和 Koopmans（1965）等学者开创与发展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下，经济增长最终决定于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因此 FDI 只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水平。以 Romer（1986）和 Lucas（1988）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指出 FDI 产生的外部经济能够突破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约束，引起经济实现长期内生增长。

上述经典经济学理论从不同角度对 FDI 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与途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阐释。然而，针对服务业 FDI 与服务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为数不多，以统计描述与实证分析为主。一些学者研究结论表明服务业 FDI 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庄丽娟，2007；赵玉娟，2011；陈景华，2013）。但也有研究表明服务业 FDI 对国内服务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仍然较弱，服务业 FDI 的作用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谭蓉娟和秦陇一，2009；刘志中，2010），姚战琪（2012）将其原因归咎

作者简介：钟晓君，经济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李江涛，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会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金融学。

基金项目：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服务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中国服务业国际化模式及经济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5YJC790156）。

为中国服务业 FDI 规模较小以及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综合已有研究我们可以发现, 鉴于学者们对于制造业 FDI 的偏向性关注, 有关服务业 FDI 与服务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仍未引起学者们的充分重视, 相关层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远远落后于当前国际直接投资大举流入服务业的实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针对服务业 FDI 驱动服务经济增长的机制与途径的研究仍然相当欠缺, 致使在实证研究过程中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而不易做出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鉴于此, 本文尝试从服务业经济生产总值核算方程出发, 剖析服务业 FDI 驱动投资流入地服务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夯实关于服务业外资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 以服务业统计数据较为详实、服务业引资和服务业发展居于全国前列的广东省为例, 对服务业 FDI 与服务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为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以及服务业引资提供理论指导与经验证据。

二、服务业 FDI 与服务业经济增长: 作用机制

本文尝试从服务业生产总值核算方程出发, 对服务业 FDI 作用服务业经济增长的机理与途径进行剖析。服务业生产总值核算方程为 $SGDP = C + I + G + (EX - IM)$, 其中, $SGDP$ 代表服务业经济增长, C 代表服务消费, I 代表服务业投资, G 代表政府对服务的支出, EX 代表服务出口, IM 代表服务进口。根据上式, 我们认为服务业 FDI 可以通过产业聚集效应、公共服务创造效应以及服务贸易效应对服务经济增长施加作用。

(一) 产业聚集效应

服务业跨国公司进入投资地的战略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制造业跨国公司先行进入, 作为其服务提供商的服务 FDI 企业随后进入, 继续为制造业跨国公司提供各种生产生活配套服务, 这就是所谓的“跟随性战略”; 另一种是服务业跨国公司率先进入投资目的地, 为当地企业以及居民提供服务, 当良好的服务环境形成后, 作为其服务对象的制造业 FDI 企业随后跟进投资, 这就是所谓的“先导性战略”。可以看出, 无论采取“跟随性战略”抑或“先导性战略”, 服务业 FDI 的进入都有可能形成规模或大或小的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引致的外部经济以及规模经济将对周围地区形成强大的辐射作用, 带动相邻地区经济发展与服务投资; 同时, 因产业集聚引致的旺盛生产和生活服务需求将促进服务业消费水平的提升。因此, 服务业 FDI 带来的产业集聚效应激发当地服务业消费与投资水平的提升, 对投资地服务业的经济增长带来促进作用。上述作用机制反映在服务业生产总值核算方程 $SGDP = C + I + G + (EX - IM)$ 中, 就是服务业 FDI 通过产业集聚效应促进当地服务业消费 (C) 和服务业投资 (I) 的提升, 进而有利于流入地服务业经济增长水平 ($SGDP$) 的提升。

(二) 公共服务创造效应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整体属于“投入型”, 公共服务是通过政府支出得到体现的,

因此财政支出可作为公共服务的衡量指标（王志锋，杨少丽，2011）。服务业 FDI 的进入对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创造效应。直接创造效应表现为服务业 FDI 的进入弥补了流入地公共服务系统的资金缺口，对流入地公共服务系统的培育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公共服务系统的完善与发展增加了公共服务提供的数量与质量，同时引发政府支出的相应增加。间接创造效应表现为服务业 FDI 通过信号和价值显示效应，引导国内服务业资金流向；通过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公共服务创造的边际成本；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水平和效率；通过外部经济效应，减少公共服务运营的交易费用。服务业 FDI 公共服务间接创造效应的发挥同样促进公共服务部门的健全与发展，政府支出也相应增加。显然，服务业 FDI 通过公共服务创造效应，增加了政府对服务业的重视与支出，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上述作用机制反映在服务业生产总值核算方程 $SGDP = C + I + G + (EX - IM)$ 中，就是服务业 FDI 通过公共服务创造效应，促进了政府对服务业的支出（ G ），进而对当地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三）服务贸易效应

一般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相互补充和相互融合 3 种关系（龚晓莺等，2006）。服务业 FDI 与服务贸易之间的替代关系表现为：当投资东道国设置了较高的服务贸易壁垒或者该项服务本身的可贸易程度较低的时候，服务业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在投资地设立分公司或者子公司，绕开贸易壁垒，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服务业 FDI 与服务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表现为：服务业 FDI 企业通过向投资母国出口或者进口服务产品，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更为常见的情形为：服务业 FDI 与服务贸易之间既相互替代，也相互补充，它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融合的关系。由此可见，服务业 FDI 通过服务贸易渠道影响服务出口与服务进口。服务出口通过为出口国提供服务产品，获得贸易所得，提高服务业生产总值；服务进口则购买进口国提供的服务产品，支出外汇，降低生产总值。因此，服务业 FDI 通过服务贸易效应，能够对服务业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如果服务业 FDI 引致的服务出口大于服务进口，则服务业 FDI 通过服务贸易渠道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相反，如果服务业 FDI 引致的服务进口大于服务出口，则服务业 FDI 通过服务贸易渠道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消极作用。上述作用机制反映在服务业生产总值核算方程 $SGDP = C + I + G + (EX - IM)$ 中，就是服务业 FDI 通过服务贸易效应，影响当地服务出口（ EX ）和服务进口（ IM ），从而对服务业经济增长施加影响，并且其影响方向取决于服务业 FDI 引致的服务贸易出口效应和服务贸易进口效应孰大孰小，若服务出口效应大于进口效应，则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则相反。

三、服务业 FDI 与服务业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在厘清服务业 FDI 与服务业经济增长关系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计量经

济模型,以服务业统计数据较为详实、服务业引资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的广东省为例,实证考察服务业 FDI 与服务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分析 FDI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候,国内外已有研究大多通过对柯布—道格拉斯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进行适当变形。本文同样对 C-D 生产函数进行变换,推导出服务业 FDI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钟晓君等, 2014), 即:

$$Y = AK^{\alpha}L^{1-\alpha}$$

其中, Y 代表服务业产出数量, K 代表资本数量, L 代表劳动力数量, A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国资本通常代表更高的生产技术水平,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是异质的。但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假定所有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是同质的,因此总资本 K 等于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加权平均,即 $K = K_d^{\mu}K_f^{1-\mu}$, 其中 K_d 表示国内资本, K_f 表示国外投资, μ 代表本国资本在资本总量中所占比重, $1-\mu$ 代表外国资本在资本总量中所占比重。将此式代入上式,得:

$$Y = A(K_d^{\mu}K_f^{1-\mu})^{\alpha}L^{1-\alpha}$$

两边取对数,得到 $\ln Y = \ln A + \alpha\mu \ln K_d + \alpha(1-\mu) \ln K_f + (1-\alpha) \ln L$ 。

因此,服务业经济增长是服务业外资、服务业内资以及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函数。

本文建立的时间序列模型如下:

$$\ln SGDP_t = C + \alpha \ln SFDI_t + \beta \ln DI_t + \gamma \ln L_t + e_t$$

各变量的含义以及数据处理过程解释如下:

(1) 被解释变量

服务业生产总值 ($SGDP$): 采用广东省服务业历年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服务业经济增长的指标,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983=100) 进行物价平减,化为剔除物价影响的实际值。

(2) 解释变量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SFDI$): 采用广东省服务业历年实际利用的 FDI 额,单位为亿美元。运用美元兑人民币年平均汇率,将计价单位转为人民币,同时用广东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983=100) 进行平减,化为剔除物价影响的广东省服务业利用 FDI 的实际量。

服务业国内投资 (DI): 利用广东省第三产业投资额 (经过价格调整) 减去服务业实际利用 FDI 额 (经过价格调整), 得到剔除价格影响的第三产业国内投资的实际量,单位为亿元。

服务业就业人员 (L): 采用广东省第三产业年末就业人员数量,单位为万人。

(二) 单位根检验

为了防止“伪回归”问题,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数据的平稳性。单位根检验的常用方法是 ADF 检验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类型 (C T P)	ADF 值	临界值			整合阶数
			10%	5%	1%	
lnSGDP	(C T 0)	-2.98585	-3.24308	-3.6122	-4.39431	I(1)
Δ lnSGDP	(C N 0)	-4.05747***	-2.63875	-2.99806	-3.75295	I(0)
lnSFDI	(C N 0)	-1.26832	-2.63554	-2.99188	-3.73785	I(1)
Δ lnSFDI	(N N 0)	-3.08449 ***	-1.6085	-1.95641	-2.66936	I(0)
lnDI	(C T 3)	-2.76695	-3.26145	-3.64496	-4.4679	I(1)
Δ lnDI	(C N 0)	-3.88504 ***	-2.63875	-2.99806	-3.75295	I(0)
lnL	(C N 3)	0.348869	-2.64612	-3.01236	-3.78803	I(1)
Δ lnL	(N N 0)	-3.02385 ***	-1.6085	-1.95641	-2.66936	I(0)

注：1. Δ表示对序列进行一阶差分；2. 检验类型中C表示含有截距项，T表示含有趋势项，P表示滞后阶数，N表示不包含常数项（趋势项）；3. *表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下同。

由表 1 可以看出，序列 lnSGDP、lnSFDI、lnDI、lnL 的水平值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上述序列的水平值都为非平稳序列；对上述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处理，ADF 检验显示 Δ lnSGDP、Δ lnSFDI、Δ lnDI、Δ lnL 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上述所有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都变为平稳序列，因此上述所有序列都为 一阶单整序列 I（1），符合进一步进行协整分析的前提条件。

（三）协整分析

运用 Johansen（1988）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回归系数检验的协整检验方法，对 lnSGDP、lnSFDI、lnDI、lnL 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协整检验

协整向量	协整向量数	特征根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 值
lnSGDP、lnSFDI、lnDI、lnL	无	0.600428	44.46639	40.17493	0.0174
lnSGDP、lnSFDI、lnDI、lnL	至多一个	0.492518	23.36709	24.27596	0.0648

由表 2 可以看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上述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同时接受变量之间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上述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标准化的协整方程为：

$$\ln SGDP=0.825113\ln SFDI+0.137775\ln DI+0.826341\ln L+e_t$$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协整方程的准确性，对方程的残差项 e_t 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残差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类型 (C T P)	ADF 值	临界值			整合阶数
			10%	5%	1%	
e_t	(C N 1)	-2.715578*	-2.638752	-2.998064	-3.75295	I（0）

由表 3 可以看出，协整方程的残差项 e_t 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

的原假设,表明 e_t 是平稳序列,验证了协整方程的存在与准确性。

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服务业FDI显著促进了广东省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将导致服务业经济增长0.825%。服务业外商投资的进入通过产业聚集效应促进了服务产业聚集的形成,扩大服务业的投资与消费;通过公共服务创造效应增加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支出,同时打破服务业原有的市场格局,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倒逼内资服务企业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与科技水平;通过服务贸易效应对服务业进出口产生作用,影响服务业国际收支。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业聚集效应、公共服务创造效应以及服务贸易效应对广东省服务业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服务业国内投资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服务业国内投资每增加1%,将导致服务业经济增长0.138%。服务业国内投资能够完善服务业发展所需的各项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业资源配置的绩效,促进服务业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效应的形成,提升服务业生产效率。近年来,伴随着广东省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服务业国内投资额呈快速增长态势,2010年的服务业国内投资额(实际量)是1986年的39.9倍。服务业国内投资的增长一方面是广东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与体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服务经济在现代产业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服务经济为代表的“软经济”实力成为经济竞争力高低的重要参照指标。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国内投资对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小于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其原因主要是广东省服务业国内投资过多集中于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较少涉足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产业。服务业国内投资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体的投资结构与近年来服务业外资以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为着力点的投资结构形成鲜明的对照。服务业FDI的现代服务业投资导向能够有效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增长,提升服务业能级,开拓服务业新的市场需求,形成服务业新的经济增长极。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广东省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传统服务业的利润率将有所降低,现代服务业将获得可观的利润率,届时服务业国内投资也将逐渐向现代服务业集中,从而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发挥更大作用。

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协整方程显示,广东省服务业就业人数每增加1%,将导致服务业经济增长0.826%。众所周知,就业人数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根据威廉一配第的产业发

展理论,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一般要经历第一产业产值占主导向第二产业产值占主导,再向第三产业产值占主导的渐次推进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就业人数比重也随着产值结构的变换呈现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渐次演进的特征。服务业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一方面体现了服务业经济良好的发展态势与服务业巨大的就业容量;另一方面,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也为服务业的发展引入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促进服务业经济快速发展。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考察服务业经济增长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对变量 $\ln SGDP$ 和 $\ln SFDI$ 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原假设	滞后期	F 值	P 值
$\ln SFDI$ 不是 $\ln SGDP$ 的格兰杰原因	6	4.13961	0.05383
$\ln SGDP$ 不是 $\ln SFDI$ 的格兰杰原因	6	1.25944	0.39329

由表 4 结果可以看出，变量 $\ln SGDP$ 和 $\ln SFDI$ 之间存在由 $\ln SFDI \rightarrow \ln SGDP$ 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经济学涵义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原因，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服务业经济增长却不是服务业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其原因可能在于服务业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除了考虑服务业经济增长水平之外，更多地还要考虑当地的制度环境以及人力资源状况等影响服务业健康发展与决定服务业 FDI 企业能否投资盈利的“软环境”与“软实力”。

（五）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了进一步反映服务业 FDI 与服务业经济增长之间在时序维度的动态相关关系，进而揭示服务业 FDI 对广东省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可以借助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Model）的脉冲响应函数。一般的脉冲响应函数的缺点在于随着 VAR 模型中内生变量顺序的改变，脉冲响应的结果也会产生较大的差异。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很好地克服这一问题，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所得的结果与 VAR 模型中变量的顺序无关（Pesaran and Shin, 1998）。

本文基于上述变量所建立的 VAR（1）模型，得到广东省服务业经济增长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图 1）。图中横轴代表脉冲响应的期数，纵轴代表 $\ln SGDP$ 对 $\ln SFDI$ 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广义脉冲响应，虚线代表正负两倍标准差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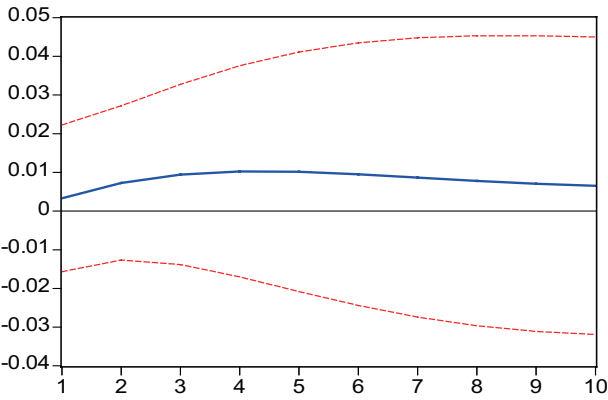


图 1 $\ln SGDP$ 对 $\ln SFDI$ 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广义脉冲响应

由图1可以看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在第1年就产生正向影响,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第2年后呈现逐年加大的趋势,在第4年服务业经济增长对服务业FDI的正向响应达到峰值,此后几年,服务业FDI对服务业经济的正向影响开始呈现逐年递减的态势。 $\ln SGDP$ 对 $\ln SFDI$ 的广义脉冲响应轨迹表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进入对服务业经济具有长久的持续正向促进效应,服务业FDI是促进服务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子。从动态时序角度来看,服务业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发挥最大促进作用的年份出现在第4年,其原因在于,服务业FDI进入的初始几年,对于陌生的经济环境可能需要一定的适应期,同样,内资服务企业面对外资的强大竞争也存在一段适应的过渡期。只有经历前4年的适应期后,服务业FDI的各种示范与溢出效应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内资服务企业也在这期间通过模仿与学习服务业FDI企业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壮大,此时服务业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发挥到最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业聚集效应、公共服务创造效应以及服务贸易效应对流入地服务业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产业聚集效应促进了服务产业聚集的形成,扩大服务业的投资与消费;公共服务创造效应增加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支出,同时打破服务业原有的市场格局,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倒逼内资服务企业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与科技水平;服务贸易效应对服务业进出口产生作用,影响服务业国际收支。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业FDI显著促进了广东省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将导致服务业经济增长0.825%。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业聚集效应、公共服务创造效应以及服务贸易效应对广东省服务业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支持了服务业FDI驱动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判断,服务业FDI是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广义脉冲响应函数轨迹揭示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进入对服务业经济具有长久的持续正向促进效应,服务业FDI是促进服务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子。

鉴于服务业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应该坚持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加强服务业招商引资,有效与充分地发挥服务业FDI带来的产业聚集、公共服务创造以及服务贸易效应,利用服务业FDI促进服务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特别是要发挥服务业FDI的带动与示范作用,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此外,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应该重视与提高内资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不断壮大内资服务企业,实现服务业外商投资与服务业国内投资对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协同推动。

参考文献:

- [1] 陈景华. 服务业FDI与东道国服务经济增长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J].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2013,(4).

- [2] 龚晓莺, 杨小勇, 王朝科.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三种关系——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引发的思考[J]. 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6,(4).
- [3] 李雪辉, 许罗丹. FDI对外资集中地区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02,(2).
- [4] 刘志中. 辽宁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1).
- [5] 邵锋祥, 袁晓玲. FDI与经济增长、国内资本及劳动力作用机理[J]. 商业研究, 2010,(4).
- [6] 孙中栋. 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D]. 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 [7] 谭蓉娟, 秦陇一. 珠三角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J]. 国际经贸探索, 2009,(12).
- [8] 王志锋, 杨少丽. FDI对东部沿海三大都市圈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比较研究——基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代表性城市的实证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6).
- [9] 姚战琪.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 财贸经济, 2012,(6).
- [10] 赵玉娟. 服务业FDI、资本效应与经济增长——基于服务业FDI、制造业FDI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实证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 2011,(3).
- [11] 钟晓君, 刘德学. 广东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J]. 国际经贸探索, 2011,(12).
- [12] 钟晓君, 刘德学.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基于广东省数据的实证研究[J]. 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4,(1).
- [13] 钟晓君, 刘德学. 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增长效应：细分服务行业视角[J]. 亚太经济, 2014,(3).
- [14] 庄丽娟. 国际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 [15] Cass, D. Optimum Growth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5, 32(3).
- [16] Chenery, H. B., Strout, A. M.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6, 56(4).
- [17] Koopmans, T. C. On the Concept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Z]. Cowles Foundation Paper 238. Reprinted from *Academiae Scientiarum Scripta Varia* 28, 1, 1965.
- [18]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22).
- [19] Pesaran, H. H., Shin, Y. Generalized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in Linear Multivariate Models[J]. Economics Letters, 1998, 58(1).
- [20] Rome,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5).
- [21] Rosto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 [22] 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 (1).
- [23] Swan, T. W.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J]. Economic Record, 1956, 32(2).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 Industry and Economic Grow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ZHONG Xiao-jun LI Jiang-tao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service FDI to economic growth, and mak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with Guangdong as exampl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service FDI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se positive effects are exerted throug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ffect, public service creation effect and service trade effect. Moreover, because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to improve the promoting function of domestic investment to service economy,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and enhance the role of domestic investment on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realizing synergy drive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on service economy.

Key words: service industry; FDI; economic growth

(责任编辑：梁丽华)

敬告作者

《国际商务研究》创刊于1980年，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主办的财经类学术理论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到2015年底已经出刊206期；主要刊载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经济法两个领域内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的论文，在学术研究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和较大的影响力，现为中文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和全国百强社科学报。目前主要开设有国际经贸、国际经济法、自贸区研究、经贸案例评析、服务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工商管理 etc 栏目。从2015年起本刊聘请了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编委会成员，增设“封面文章”栏目，主要刊发当前国际经贸领域有关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

本刊以学术质量为标准，择优采用论证缜密、有创新理论的论文。实行优稿优酬，优质稿件优先刊发，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惠赐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来稿一经刊用，本刊即付稿酬并奉寄两本样刊。来稿被正式接受后，本刊将向作者发出电子版录用通知书。在收到电子录用通知后，需要纸质录用通知书的作者可以来函索取。

本刊从2015年开始只接受在线投稿。对于投稿的具体格式和要求，请访问本刊唯一的在线投稿系统网址：<http://gjsj.cbpt.cnki.net/>，也欢迎来电来函咨询。本刊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未委托过任何其他机构、个人和网站收受稿件，请作者注意。如有任何问题，请与编辑部联系。电话：021-52067319；传真：021-52067212；Email: ibrjournal@126.com。

《国际商务研究》编辑部